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

王文兵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不断认识和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方式就是把握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其根本旨趣是确立两者上达下贯之道,避免陷入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形成一种富有活力的思维方式、解释系统和实践方式,获得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推动,更好地反思历史,把握现实,展望未来,不断探索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是一种历史性建构,需要根据时代和国情的重大变化不断地建构、维护和调整,并因此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思想重心和理论形式。只有把握住这一内在张力,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想与现实;内在张力;上达下贯

中图分类号: A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15)01-0001-06

不断认识和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出现过现实关怀淹没理想追求的历史场景,那是以感官享受和功利追求为舞台的争夺之战,足以使社会滋生攀比奢靡之风和虚无之感;也出现过理想追求淹没现实关怀的历史场景,那仿佛是以精神狂热和禁欲主义为主调的朝圣之旅,足以使社会陷入偶像崇拜,乃至走火入魔。在中外历史上,人们已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脱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意义。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方式就是把握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使之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不断开辟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不断开辟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跳动的内在脉搏。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内在张力,我们既需要从一般意义上不断思考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更需要在

全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之道及其思想脉络。只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关系。

一、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基本要求

自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以后,人就不可能再局限于按其本能来行动,理想追求就成为实践的构成要素并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因此,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是由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双重特性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悖谬。如何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理想追求与现实要求协调起来并使之能够良性互动与双向转化,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人们都需要理想追求和现实关怀,都需要认识和把握好理想与现实及其关系。缺乏现实关怀,势必使人失去立足之地;缺乏理想追求,势必使人失去人生意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5-0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想与现实张力之历史性建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构性研究”(项目批准号 08BKS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历程研究”(课题批准号 11JJD710008);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作者简介: 王文兵(1966—),男,哲学博士,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处置不当,势必使人进退失据。人们既深受不明理想之苦,也深受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多种理想相互冲突之苦;因为在深受理想激励的同时,人们也不时为之所累。人们既深受脱离现实之苦,也深受迁就现实和现实冲突之苦;在现实给予人们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严重束缚人们的手脚和心思。没有理想,人们将难以承受人生之轻;陷入理想狂热,人们将难以背负人生之重。偏执于理想追求,会使人们不满、浮躁;安于现状,则会使人们麻木萎靡,不求进取。而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则如同“驷马分尸”般撕裂着人们的身心,深受怀疑、失望和狂热的折磨。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对狂热的理想主义、颓唐的虚无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深刻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各自的片面性,获得了将理想与现实合理地结合起来的愿望、经验、能力和勇气,要求把握和构建两者的合理张力,力图使其思想、事业和生活获得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支撑。

理想追求本来是一种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动机、目的、愿望和图景,但人们却常常遭受因理想追求不当而导致的苦难。历史反复说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一旦脱离现实要求和现实条件,一旦脱离深思熟虑的考量权衡而被狂热情感所左右,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到头来获得的可能是悲惨的结果。马克思总结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遭受过理想追求不当而导致的苦难就放弃理想追求。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理想,而是如何正确确立、对待、管理和实现我们的理想追求,如何培养、维系、提升和扩展我们的现实关怀和理性精神并与我们的理想追求相协调,避免陷入盲目和狂热的境地,不断开辟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

要将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关怀、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等相互冲突的对立因素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两者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并由此得以良性互动,不是一种容易把握和筹划的事情。依照两者择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情世俗常常使人们容易陷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也曾感叹,把握事物之中道的艰难。人

们想问题,办事情,很难恰如其分,适可而止,不是不足,就是过头。时时处处让人们都做到左右逢源、两头兼顾、通权达变,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和境界。但这种两头兼顾、“叩其两端而问”的态度、要求和思维方式则可以使我们努力避免或随时纠正极端性和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3]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目的就是要兼顾理想与现实,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防止偏于一面的极端化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努力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及其双向转化,使理想得以不断夯实其现实基础,使现实得以不断提升其理想追求,避免陷入割裂理想与现实辩证关系的极端倾向。

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就是要确立两者上达下贯之道。理想要下得去,要有下贯之门,才能获得其立足地和现实感;现实要上得来,要有上达之道,才能获得其意义感和方向感;上下贯通而又保持各自的界限、地位、优势和功能,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运动。只有确立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认同,一个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既井然有序又生动活泼,人们才能过一种既脚踏实地又富有意义的生活,既不粗俗冷漠,又不急躁狂热。为此,我们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守护和培育自己的理想追求,避免失去理想追求而陷入迷茫境地,在受理想照耀的同时也要防止被理想之火灼伤。其次,我们必须冷静仔细地洞察和把握现实情况,站稳立足之地,既能够直面现实又不为之所限。最后,我们必须审慎地衡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合理地调节和运用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探寻两者上达下贯之道,时刻注意防止现实与理想的混淆或僭越,低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以为实现理想指日可待。有学者说:“理想之可以下贯到现实是一回事,理想之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又是另一回事。两方面必须互相平衡:一方面当下即是,无所亏欠;另一方面永远不足,努力不懈。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而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于事物必须同时采取彻底理想主义以及彻底现实主义的观点,才不会流于一偏,产生不良的后果。”^[4]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形成、维护、调整 and 强化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此上达下贯之道。

这里所谓合理张力是指这样一种运行状态和弹性空间,即理想与现实之间能够不断相互促动、相互交流、相互制衡、相互调整、相互转化、相互充实、相互提升,从而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转化为两者相互转化的动力,使现实逐步拓展和提升其理想追求,使理想逐步充实其现实内容。有学者说:“实践目的确定固然基于人的需要、能力及其与对象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一种极富伸缩性的可能的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内,目的越是远大,越是能够与实践的起点之间形成张力,就越能够激励实践者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使实践获得成功。”^[5]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能力来自于我们对于理想与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来自于我们对于理想与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理解,来自于对它们互为中介的矛盾转化的理解。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旨在避免陷入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形成一种富有动力和活力的思维方式、解释系统、行动纲领和实践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重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和筹划理想与现实得以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从而使我们的思想、事业和生活获得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支持,既具有坚实基础又满含深刻意义,避免陷入丧失理想追求的无意义生活或失却现实关怀的盲目狂热,不断探索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之道

在认识和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辛探索,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曲折,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他们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精神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下贯之道,其核心内容是适时确立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历史阶梯,不断开辟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从其思想路径而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建构、维护、调整和重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历史过程。如何将共产主义理想这一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远社会理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如何以之为目标远景、

精神动力和思想旗帜来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如何将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要求和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如何探索和筹划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既存在着急切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空想论”及其急躁倾向,也存在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渺茫论”及其失望情绪。因此,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及其各种延伸物,确立一种将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有机结合使之相互制约、相互促动的思维方式、精神心理状态和行动方式,即一种既具有原则的坚定性又具有策略的灵活性的思维方式、精神心理状态和行动方式,从而使我们既能够保持远大的理想追求,高瞻远瞩,又能够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下贯。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下贯,必须不断探索、把握、确立和调整两者良性互动的性质、目标、步骤和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中,曾数次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企图早日实现理想。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把握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重要目的就是反对把那些将来才可能做到的事情放在现在来做,反对那种一步到位的简单想法和急于求成的急躁心理,反对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方法来实现预期目的,反对那种千篇一律的“一刀切”做法,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平坦的,目的与方法之间并不总是直接呼应、一望可知的,有时是相互背离、充满冲突的,因而需要采取迂回的路线,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6]503}毛泽东常常强调的原则的坚定性

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实质上就是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基本原则。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必须注意“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7]107}只有这样,才能为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提供足够的历史时间和思考空间,形成使两者得以上达下贯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和社会结构。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不断探索共产主义理想落实到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社会实践的途径和方法。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下贯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历史化、过程化,即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中国社会现实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条件以及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将之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未来前景,也就是将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远方”而实现其内在化。第二,通过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层次化、目标化,即通过确立一系列阶段性奋斗目标并阐明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将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上方”,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下贯。第三,通过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结构化、制度化,即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将之作为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将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中间”,通过结构化、制度化而将共产主义理想“嵌入”中国社会现实生活。通过上述步骤,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及其巨大的历史性距离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即维护和促使理想与现实实现良性互动、双向转化的张力结构,以此不断纠正和克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滋生的“渺茫论”及其失望情绪和“空想论”及其急躁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下贯之道的探索,同时也是对现实上达之道的探索,这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非两个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思维过程和实践过程。从理想看现实,则是现实的上达之道;从现实看理想,则是理想的下贯之道。如果说,理想的下贯之道重在充实理想的现实内容,那么,现实的上达之道则重在提升现实的理想含量。现实的上达之道最重要的内容是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未来远景、精神动力、思想原则、价值尺度,指导、推动、规约、评判和提升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

过程。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社会现实的上达之道主要包括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以革命为核心的解放过程,通过推翻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变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沉沦局面,改变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抗性关系,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以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过程,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缩短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历史性距离,推进了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变化而不断理解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以认识 and 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变化的基本轨迹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大体而言,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题经历了三次重心转移。第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重心转移;第二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心转移;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转移。每一次重心转移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三次重心转移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历史性建构。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很快认识到,中国社会不可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中国革命国内外形势的不同判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主张中国社会先搞资产阶级革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一次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急转直下而行向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证明,这两种革命理论都未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正是针对“二次革命论”的等待论

及其观望情绪和“一次革命论”的空想论及其急躁情绪,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通向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依然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样注意纠正和克服那些超越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现实要求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空想倾向及其急躁情绪。1952年9月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8]533}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现实不能把社会主义理想作为直接的行动纲领,对于资产阶级,更不能要求他们普遍接受社会主义。一些先进分子当然可以也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但不能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变为大规模的群众性实践。对此,毛泽东冷静而果断地说:“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8]534}可以说,此时毛泽东非常审慎地把握住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注意纠正和克服那种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急躁情绪,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又保持了直面现实的求实态度,把握和维护了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合理张力。

在筹划社会主义改造方案时,毛泽东仍然注意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在理想追求与现实状况之间反复掂量,试图将人们渴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协调起来,因而他最初在估计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所需的时间时,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以期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9月7日,毛泽东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6]326}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

改造的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原初的构想和筹划,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不免带来了工作太粗、步子太急等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迅速改变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为此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在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解决的任务。”^{[9]693-694}由于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割裂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相互关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依据,重新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1990年,胡乔木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评论道:“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能预见,而且由高变低,即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而集体所有制是按照某种经典人为地造成的),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9]693}这里,胡乔木用“由近变远”、“由短变长”、“由高变低”三个“转变”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重新建构。同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正确把握和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从而能够“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

和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不是一种先验结构,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种历史性建构,需要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不断地建构、维护和调整,并因此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思想重心和理论形式。它只有在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 and 实践探索中,才能获得其明确的概念规定和理论内容。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内容、重心和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不断建构、维护和调整这一张力关系,并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达,才能阐明和推进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9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59.
- [3]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9.
- [4] 刘述先. 理想与现实的纠结[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自序:2.
- [5] 张曙光.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 [9] 胡乔木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nherent Tension i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ANG Wen-b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human life is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The basic way to dynamically combine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is to deal with and construc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in a rational way.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is to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to avoid the extreme ways of thinking and action. In this way, a vigorous way of thinking, an explanatory system and a way of practice can be formed, by which we can nourish ideal and reality, objectively reflect on history, hav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and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right way to the ideal from reality. For the cause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hat is imperative is to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he rational tens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ideal and China's social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tension is historical and needs to be developed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and adjusted in line with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us having different contents in different ages, different ideological focuses and theoretical forms. Only by keeping to this inherent tension can we thoroughly understand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ras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Key Words: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deal and reality; inherent tension; conn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苗怀明，男，1968年7月生，河南平舆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小说网创办人及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近现代学术史，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风起红楼》、《吴梅评传》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数百篇。目前正从事说唱文学方面的研究。

王文兵，1966年3月生，男，河北怀安人，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和参编《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变革》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与人生意义》等学术论文60余篇，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

